

## 西方形而上学及其现代命运

李朝东 董春莉

(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甘肃兰州 730070)

**内容摘要:** 西方思想语境中的形而上学是指关于存在、知识和文化的最高的和超验原则的哲学理论, 它的核心是Ontologie, 形而上学的Ontologie是个纯粹抽象的逻辑理念王国。“Sein”之实存和本质两种意义的剥离, 使西方语言及哲学中具有了“科学性”和“哲学性”两类范畴, 因而, 在西方哲学中形成了“科学主义”和“形而上学”两大传统。在现代西方哲学的超越性思考中, 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具有永恒的魅力: 哲学作为感性与理性、有限与无限、暂时与永恒、自由与必然的永恒矛盾及其超越, 只有在具体的社会历史实践中去完成, 人的存在意义只能在开放的感性实践中去生成。

**关键词:** 存在; 形而上学; 语言论; 科学主义

**中图分类号:** B08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804(2007)05-0027-15

Was erfaßt es als das Wesentliche des antiken Menschen? Nach einigem Schwanken nichts anderes als die “philosophische” Daseinsform: das frei sich selbst, seinem ganzen Leben, seine regel aus reiner Vernunft, aus der Philosophische Geben. Theoretische Philosophie ist das Erste. Eine überlegene Weltbetrachtung, frei von den Bindungen des Mythos und der Tradition überhaupt, soll ins Werk gesetzt werden, eine universale Welt- und Menschenerkenntnis in absoluter Vorurteilslosigkeit—schließlich in der Welt selbst die ihr innewohnende Vernunft und Teleologie und ihr oberstes Prinzip: gott, erkennend<sup>[1]56</sup>.

(对于古代西方人来说什么是最根本的呢? 比较可知, 它无非是“哲学的”人生存在形式: 根据纯粹的理性, 即根据哲学, 自由地塑造他们自己, 塑造他们的整个生活, 塑造他们的法律。理论哲学居于首位。对世界的明智观察应摆脱各种神话的整个传统的束缚, 应绝对毫无先入之见地去认识普遍的世界和人, 并最终在世界本身之中认识它的内在理性和神学, 以及它的绝对原则: 上帝。)

胡塞尔(Husserl)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中所说的话也适合于整个西方民族。西方民族是个哲学的民族, 形而上学是其精神灵魂。当形而上学在近代全球的文明进程中发力时, 我们没有抓住它的要领; 当我们大体抓住它的要领时, 它正在从欧洲内在的历史进程中退出, 这意味着“西方思想与大地的最后的一点联系也终于被阻截了, 意

味着西方文明的全球化进程已经完成, 意味着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已经离开地球的覆盖性的约束, 在视野上人类将进入一个不被太阳系束缚的宇宙。一个没有太阳的思想世界将给人类带来无目的无方向的无意义的漂泊的命运。”<sup>[2]16-17</sup>对西方形而上学的系统清理已经成为了悟西方民族和掌握人类未来命运的内在要求。本文从汉语思想的视角试图对西方形而上学进行系统的学理梳理, 以期获得对形而上学比较完整的理解和把握。

人类求知的无限本性要求超越的本体论思考。在古希腊罗马时代, 传统形而上学作为关于世界、上帝和人的存在的“第一科学”, 对于其他科学知识具有一种无可争辩的绝对优先性。其中, 关于存在的意义及其根本性质和法则问题, 关于作为行为主体的人应该遵守的有效规范的伦理问题, 关于人类认识的范围、程度和方法等逻辑、认识论问题, 早在2500年前就已经支配着那些创造了理性精神的希腊思想家了, 并构成西方哲学关注的中心和思想传统。数千年来, 哲学家们尝试建立各种形而上学体系以期解决这些基本问题的努力, 一方面表明他们顽强不屈和不知疲倦的精神追求, 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一个悲观的结论, 即哲学虽然是一种永无止境的诚实劳作和努力, 但却又是一种不断遭到失败的努力, 这种逻辑上的二难境地与某种哲学理论运思

收稿日期: 2007-08-04.

基金项目: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20060390084)和西北师范大学科技创新项目共同资助。

作者简介: 李朝东(1962-), 男, 甘肃景泰人, 博士, 清华大学博士后, 教授, 从事德国近现代哲学研究。

上的心理气质相结合,很可能由此滋生出乐观主义信念与悲观主义情愫的悲剧冲突。

从哲学或形而上学自身的历史逻辑嬗变来看,在古希腊罗马晚期,希腊的哲学理性精神、罗马的法制精神和希伯来民族的宗教伦理精神整合而融汇为基督教文明,哲学和神学携手成为支配世界秩序和人类生活的基本原则。在自文艺复兴运动中孕育成熟起来的科学理性精神面前,基督教的神圣至上的宝座开始动摇。从17世纪以来到黑格尔(Hegel)为止的两个世纪中,哲学亦开始在科学精神面前为自己的合法性证明,哲学在对科学的自卫中建构自己并一直试图调和传统形而上学和现代科学精神。随着康德摧毁了教条主义的形而上学和批判地证明了现代经验科学的正确性后,黑格尔哲学的绝对精神王国的迅速崩溃以惊人的方式表明了形而上学的终结。但是,黑格尔的名言不容回避:一个没有形而上学的民族就像一座没有祭坛的神庙。如果没有形而上的哲学,我们就无法深刻地理解支配我们时代的科学并对由科学铸成的生活作出估价和判断。形而上学作为哲学理论思维的最高形式,不能放弃探讨自己的问题并肩负起对人类生活进行规范和引导的责任,以不断获得对人类新的自我理解。

#### (一) 西方哲学形成于对日常语言的改造并具有本体和逻辑特性

在西方思想的语境中,哲学起源于希腊人对Alles Seiende ist im Sein(一切在者在于在中)的惊讶,由于希腊人的这种惊讶,哲学就有了起源,哲学就存在者之存在,询问和探求存在是什么。追问“存在是什么”,标志着哲学的开端。由于“是什么”的提问方式,Sein(存在)被当作了一个对象性范畴加以探究。关于存在问题的范畴体系称为Ontologie(本体论或本体论),以Ontologie为核心的哲学体系称为“形而上学”。

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形而上学”是指关于存在、知识和文化的最高的和超验原则的哲学理论。这个术语是公元前一世纪亚里士多德(Aristotles)研究者对亚氏著作进行分类时提出来的,他们把亚氏研究和讨论具体事物的本质、特性的论著归类并统称为Physik(物理学),然后把亚氏研究“存在本身”或“作为存在的存在”的第一哲学称为Metaphysik,直译为“物理学之后诸篇”,中文取“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之意,译作“形而上学”。按照近代德国哲学家沃尔夫(Wolff)的划分:哲学分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两类,理论哲学又划分为“逻辑学”和“形

而上学”两部分。其中,无论是西方古代的亚里士多德还是17世纪德国哲学家沃尔夫,都把理论哲学中的形而上学(Metaphysik)划分为“本体论”(Ontologie)和“宇宙论”(Kosmologie)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以及由此派生的各种具有形而上学性质的问题,如宇宙和谐统一性、神灵存在及其启示、人的本质、美的实质、伦理道德规范的绝对性、认识的真理性和其普遍必然性,等等。

“宇宙论”是从泰勒斯(Thales)到巴门尼德(Parmenides)以前西方哲学在形态学上的表现,即追问宇宙产生或构成的本原、始基。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所谓本原或始基,就是那使万物得以产生又使万物消灭以后复归于它的东西,如水、气、火、土等具体的原初物质。它追问和回答宇宙万物在时间上产生形成及空间上的构造问题。但是,在西方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对本原的追问最终导致了本原问题在哲学形态上的取消,代之以Ontologie的产生。Kosmologie是描述性的,Ontologie是概念性的。宇宙论哲学即自然哲学对万物构成和宇宙起源的追问最后让位于科学的精确描述,就此而言,没有宇宙论哲学形态的消失,就不会有自然科学的独立和发展,自然科学的独立发展是以宇宙论哲学的消亡为前提的,虽然这并不否定自然科学的结论可以不断提高到自然哲学或宇宙论哲学的概括水平上,如牛顿(Newton)和爱因斯坦(Einste)科学理论被提升为科学哲学。

有意思的是,在中国哲学的语境中没有本体论与宇宙论的划分,或者准确地说,本体论和宇宙论是不分的和混淆为一的。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上下卷)中,没有“宇宙论”词条,而对本体论的解释实际上是宇宙论的:

本体论……在西方哲学史中,指关于存在及其本质和规律的学说。“本体”一词来自拉丁文On(存在、有、是)和Ontos(存在物)。德国经院学者郭克兰纽(1547~1628)在其著作中第一次使用了“本体论”一词,将其解释为形而上学的同义语……。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本体论叫做“本根论”,指探究天地万物产生、存在、发展原因和根本依据的学说。这本根可以分为三类:(1)没有固定形体的物质,如“气”;(2)抽象的概念或原则,如“无”、“理”;(3)主观精神,如“心”。<sup>[9]34</sup>

如此看来,中国古代哲学是在类似于西方宇宙论哲学或自然哲学的意义上来使用“本体论”概念的,中国哲学的概念在本质上是对经验现象的概括,因此,用指称经验现象概括的“气”、“理”、“心”等而形成的所谓本体论,能否

对应翻译西方哲学中以On为核心建立起来的范畴体系，确实是个问题。必须明了的是，在中国文化体系中，本体论与宇宙论的不分或混淆使得宇宙论一直占据着中国古代哲学的主导形态，成为中国哲学中的支配性或权利话语系统，这使得中国没有发生西方由于宇宙论哲学形态的消亡而使科学得以独立和发展的情形。当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提出“火”与“逻各斯”时，就已表明西方哲学处于科学与哲学的分离时刻，对宇宙起源探究的宇宙论在哲学形态上让位于巴门尼德的以On为核心来建立范畴体系的本体论，而探究宇宙起源的宇宙论其自身形态和任务则让位于科学，即由科学担当起对世界起源和结构问题的精确研究，如物理学、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等。这一转化在中国哲学中的缺失使宇宙论一直占据着哲学的形态，没能在哲学之外提供给科学独立的机会和自身的发展，当然也就不会形成西方哲学本体论哲学与科学之间的那种特殊的关系。

如何理解和翻译Ontologie呢？在Metaphysik中，Ontologie就是研究On（拉丁文ens、英文Being、德文Sein）的学问。它是西方哲学的最高范畴和基础性概念，是理解西方哲学文化的关键。从西方人的思维特征来看，他们对语言和思维活动中普遍起作用的“是”感到十分惊讶：一切东西都因为“是”而成为是某某的东西。于是，对“是”的追问就成了西方思想家历史性此在的存在态度和生存方式，而这种生存方式也就成为哲学的对象并表达在形而上学中。因此，所谓Ontologie，就是以希腊文On（德文Sein）为核心范畴以及与其相关的一系列范畴构成的具有形而上特征的理论体系。它通常被译为“本体论”、“存在论”，但考虑到中国思想在宇宙论意义上使用本体论概念，所以，把Ontologie译为“存在论”可能更合乎原意。就是说，西方人对语言现象的语法学考察对On这个本体论的核心范畴的形成是个决定性事件。在古代希腊人那里，语言表征并包含着源始的生活经验，因而语言被当作某种存在者加以把握；而语言首先被认为是在文字、符号和字母中存在着，把语言和词语当作存在者对象来表象和认识从而形成了“语法学”。语法学就是要在词语及其变化形态中寻找基本形态，形成语法结构，发现语法规律。就动词来看，一个动词依句子表达的人称、性、数、时态、语态各有不同的形态，“不定式”是对不同形态动词的概括，是动词从句子中分离出来后的独立形态式。不定式这种语法形式的出现，不再表示其他动词所揭示的东西，不再表示任

何确定的意义关系而成为一个“抽象的动词概念”，它连带着动名词、分词等语法现象的出现。语法的成熟使西方语言越来越形式化和逻辑化，而“不定式”的出现正是西方语言高度形式化的一个标志。

希腊哲学或形而上学就是在这高度逻辑化和形式化的成熟的语言基础上产生的。巴门尼德就曾经用三个希腊文表达“存在”：即estin（is/ist），to eon（系词的分词形式Being/das Sein），einai（不定式to be/sein）。巴门尼德之后，柏拉图（Platon）和亚里士多德常用系动词的中性分词On或Onta来概括所有的estin、to eon和einai，后来On就成为表达“存在”的话语。在他们那里，On既有“存在着”这种动词含义，又有“存在者”这种名词含义，如此，On这个分词就成了表示形而上学中先验的和超验的超越者的词语，On作为独立的、普遍的、高度形式化了的“概念词语”成了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形而上学的Ontologie据此（Onta）而构成。

概言之，西方哲学中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存在”（Sein）范畴是系动词或不定式“是”的动名词化。西方语言中不定式“是”的形成及其进一步的动名词化，也就是哲学或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形成、产生过程。由于“存在”（Sein）的高度抽象化和形式化，Sein就成了西方人的历史性此在的存在态度和生存方式，而这种存在态度和生存方式就成了哲学的对象并表达在形而上学中。当然，在希腊文中，并没有“存在”、“本质”这些词，它们不过是“是”的不同的逻辑意义，从逻辑上分析，系动词sein具有“指示存在”、“陈述属性”和“表达定义”三种功能。其中，“指示存在”和“陈述属性”表示事物的“实存”，而在“表达定义”（如S是D）的逻辑表达式中，D是用定义的形式表达本体存在（S）的本质（ousia）的，即只有在“定义”中揭示了S的D，才真正弄清本体是何以存在的。实存，由于其表示的是事物在现实中出现的实际状况，体现了事物的变化方面；本质，由于其表示的是事物之间的相互区别，体现了事物的稳定方面。

进一步来看，希腊人在对语言的语法学研究中混淆了语法范畴和逻辑范畴，用逻辑范畴来进行语法研究，并把语言的语法范畴视为逻辑范畴的体现。由于语言的逻辑化，以“Sein”为研究对象的形而上学便具有了逻辑本性。或者说，形而上学研究 and 讨论On以及与之相关的范畴，是围绕On范畴建立起来的范畴体系，并形成一种逻辑方法，而体系的建立又依据这种逻辑方法。质言之，形而上学范畴

体系的建立以“存在”范畴的理性逻辑演绎为实现手段和方式。这一特点突出地表现在黑格尔哲学中,他的哲学也因此被看成是传统形而上学的集大成者和最终完成。

真正说来,对于形而上学体系的形成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柏拉图,他首创了On这个范畴。On范畴在柏拉图那里既表示“存在”这个理念本身,又可以表示一切分有“存在”、与“存在”结合的其他理念。在亚里士多德的意义,哲学至少由“逻辑学”、“形而上学”、“物理学”三部分构成,但追求本原的宇宙论从哲学中离析出来并形成“科学”的研究领域,即形而下的物理、数理、地理等科学理论,形而上学的哲学形态则主要是Ontologie,既关于“是”或“存在”的学说。他正式把“存在”(On)提出来作为并当成一门独立的科学,认为形而上学研究的对象是“作为存在的存在”或“存在本身”,追问一切存在者之所以存在者的根据,他称形而上学为“第一哲学”,其核心是以逻辑推论的方式通过揭示本体与其他相关范畴的关系来讨论本体的规定性。希腊本体论哲学昭示给我们的是:形而上学的范畴主要是从语词所代表的概念的意义分类中得出的,而不是从对实际事物的直接观察中得出的;而以形而上学为核心的西方哲学就是一个不断延伸着的真理的证明体系:

总有这么三个环节:已经证明了的,用来作证明的和想要去证明的。这个证明体系完成于亚里士多德。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已经证明了的这个环节由形而上学(后物理学)来承担;用来作证明的这个环节由工具论(形式逻辑)来承担;要去证明的这个环节由物理学来承担。对应于证明体系的这三个环节,真理具有三种语义:批判意义上的真理(后物理学—形而上学),形式意义上的真理(工具论—逻辑),实证意义上的真理(物理—经验世界)。哲学指的就是这个证明体系,而不是指的这个证明体系的某一个环节。<sup>[2]4</sup>

西方传统哲学家所关注的是形而上学的Ontologie这个纯粹抽象的逻辑理念王国。它一方面培养和训练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并支持了西方数学和精密科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以对智慧、自由的思考和追求来实现人的终极关怀。它上承神学,下启科学。彼岸神学是无限、绝对、永恒、无条件性;此岸科学是有限、相对、暂时、有条件性。哲学则以对无限与有限、绝对与相对、永恒与暂时、无条件性与有条件性关系的思考,试图说明彼岸与此岸、神学与科学、神与人的关系,说不可说之神秘,探询自由的秘密,因为在本体

范畴的演绎中对终极关怀的追求有可能变成对无限和整体玄学渴慕,即形而上学信仰。不了解形而上学的Ontologie,我们不仅不能理解哲学中无限与有限、绝对与相对、永恒与暂时、无条件性与有条件性的关系,而且无法深入理解西方精神的内在秘密。

从以存在为核心范畴的Ontologie角度来看,中国没有形成Ontologie意义上的哲学。在中国的先秦时期,汉语中没有把“是”从其上下文中独立出来的习惯(没有系词),未能从相互关系中获得逻辑规定性的概念,因而中国人没有西方Ontologie的那一套思维方式;由于汉语语言是象形文字而非字母拼音文字,语词没有性、数、格、时态的变化,动词没有不定式和动名词的形式;汉语言形式化和“语法学”的缺乏,使中国哲学或文化所塑造的中国人缺乏形式化的思维方式。在西方哲学的Ontologie思考方式和思维习惯中,可以“名不副实”而在纯粹的概念王国中加以训练;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中则要求“名副其实”,以致我们在理解哲学的抽象逻辑概念时,也总是联系着它们所对应的经验事实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是先于经验事实的纯粹的逻辑规定性。这使得我们总是把Ontologie中纯粹抽象的Sein(存在)理解为具有经验性质的Dasein(实存),二者的差别就像 $3+4=7$ 的数字运算与 $X+Y=Z$ 的代数运算一样。传统中国哲学和文化所造成的思维方式只教会了国人类似数字运算的具体的思考方式,而从根本上缺失了类似代数运算的抽象思辨的思考方式;即使进入抽象的领域,国人也总是以诗性的想象代替逻辑精确的推论。这种诗性智慧使国人因缺乏逻辑学的支持而未能发展出“科学”,作为天才直觉而产生的“技术”因缺乏形式化的数学等科学的支持而极具“个人化”特征,但却不能获得持久性的发展,这也是困扰着李约瑟博士的中国古代为何“有技术而无科学”难题的最终秘密。

## (二) 西方哲学的两次转向与形而上学的历史命运

西方哲学发展过程出现了两次变革或转向已成为人们把握哲学发展线索的一种共识,即古代本体论→近代知识论→现代语言论<sup>[4]6</sup>。其中,“知识论转向”使哲学的基础从古代本体论变为近代知识论,从研究超验存在转为研究认识的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把对存在的分析转向对意识的分析;“语言论转向”则把近代哲学对主体和客体关系的研究转变成了现代哲学对主体间交流和传达问题的研究,把对主体研究从观念、思想等心理领域转移到对语言和人

的生活世界意义的研究。人的生活世界是个意义的世界,意义需要理解,正是由于语言才使得意义理解成为可能的。因此,对语言的研究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共同特点。下面从西方哲学两次转向的视角来考察形而上学的历史命运。

西方哲学的第一次转向是“知识论转向”,即古代本体论向近代知识论的转变。在古代本体论阶段,“存在”范畴具有两种最基本的涵义:一种是从Sein作为实义动词转化为动名词而具有的意义,如“Ich bin”(我存在)这种语言结构中的“存在”(bin),强调的是我这个存在物在现实中出现的事实,表示某个存在物的实存(Existenz),它与缺乏相区别。另一种是从sein作为系动词而具有的意义,如“人是理性动物”这种语言结构中的“存在”,表示一个存在物的本质,即它所“是”的东西,与别的存在物相区别。

Sein的“实存”和“本质”两种意义的剥离及其相互关系的争论,成为传统哲学中最根本的问题之一。实存论者认为,在所有存在物中,实存先于本质并决定本质。由于事物的实存本身就是一种不断走出自身的过程,因而表现为不断变化的现象,由此决定的本质作为“实体”就是变化着的本质;本质论者认为,本质先于实存并决定实存,事物的本质实际上是稳定不变的“实体”,实存只表示一个事物由此本质决定的在现实中出现的事实本身,而不再表示其在现实中出现的具体状况了。历史地看,实存与本质作为“存在”的构成及其相互关系,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著作中以个别和一般的形式加以讨论,并成为中世纪唯名论和唯实论争论的主题。此后,笛卡儿(Descartes)和康德在认识论意义上讨论过实存和本质的关系。但是,一般而言,从柏拉图开始的古代哲学发展中,基本上是本质主义占统治地位。如果说构成“存在”之实存和本质的二重要素其相互关系在历史上表现为本质决定实存的本体论,则这种本体论就是所谓传统的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本体论所遭遇的第一次挑战始自近代哲学中知识论的凸显。根本来说,知识论是从形而上学内部对形而上学的反动,是把形而上学本体论转化为形而上学的知识论。或者说,本体论向知识论的转向或知识论对本体论的反动,其实质是在同一哲学传统内部进行的,因为本体论和知识论的基本问题是同一的。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被规定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历史地看,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在巴门尼德那里表现为主客未分的“思维与存在同一”的命题,二者的分离是从柏拉图开始的。在

柏拉图那里,思维是主体,存在是客体,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成了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关系。传统哲学就是建立在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二分及其相互关系的基础上。需要指出的是,思维与存在的分离在本体论时期是初步的、不自觉的,因而主体认识客体本质的活动表现为,本质自身的范畴演绎过程以及范畴演绎过程所遵循的理性思维逻辑规则。换言之,思维主体尚隐没于存在客体之中,本体范畴的演绎表现为逻辑主体(非自觉的思维主体)的展开过程。

本体论向知识论的转化,一方面是本体论哲学范畴演绎自身逻辑困难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是以主体和客体的区分形式的自觉和确定化为前提的。这造成如下二重结果:以主体性原则的自觉化为标志的知识论本欲解决本体论范畴演绎的逻辑困难,以图从形而上学内部来改造本体论;但用思维主体来取代存在本质作为考察问题的基点,最终导致知识论对本体论的反对。

从存在(Sein)中分离出主体以确立主体性原则,是理解本体论向知识论转化的关键。在“存在”的二重构成因素——本质和实存——中,实存意味着存在物之存在的现实性,存在物之现实性即其可知性,只有在存在物与主体的关系中才是可能的或可以理解的,因而,实存隐含着存在物与主体的关系。本质意味着存在物确定其为何物的规定性,本质作为规定性主要是指存在物的形式或本质。形式作为存在物的本质,不是某物显现而被感官或理智所看到的形式,而是主体赋予存在物的形式,因此,形式与主体的活动有关。总括而言,实存和本质作为存在物之存在的构成,其存在本身及范畴演绎的可能性以主体的剥离和自觉为前提。如此,主体性原则得以建立。

本体论到知识论的转向是在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条道路上进行的。理性主义以笛卡儿为开端,他的基本原则是“我思,故我在”。在本体论哲学中,“存在”的意义是在同其他范畴的关系中得到规定的;在笛卡儿那里,“存在”的意义不是从其他范畴关系中推论出来的,而是从反省当下“我思”中得出的。“我思,故我在”命题使思维主体得以自觉和确立。在此基点上,笛卡儿基本上把本体论范畴作为知识论范畴接受下来,本体论的逻辑也就成了认识的理性。在此后的斯宾诺莎(Spinoza)那里,范畴体系中的本体被看作是认识对象的实体,范畴则成了一切存在物所具有的思维属性,他虽然也坚持本体论范畴体系的逻辑推论方法,但却把思维推论

看作是主体的理性认识及其思维活动过程。然而,经验主义则对于范畴体系的逻辑演绎不感兴趣,把眼光固守于经验知识领域,对本体论持否定态度。在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命题中,存在物之存在是以感觉经验来确证的,对于不能从感觉经验中确证的范畴则予以清除,形而上学处于危机之中。

形而上学危机的实质是理性和信仰的对立。在本体论哲学中,终极本体(柏拉图“善”的理念、经院哲学的“上帝”等)既是本体论范畴推演的最终结果,又是使本体论范畴推演得以可能的前提条件,因而具有超越知识成为信仰的意味,在范畴推演中对终极本体的追求变成对无限和整体的玄学渴慕,即形而上学信仰。知识论则试图把本体的范畴推演转化为思维主体理智认知活动,纵容理智的僭妄,使认知超越有限达于无限以取代对无限的信仰。质言之,本体论和知识论的重要分歧在于:无限和整体究竟是“信仰”还是“知”的领域。休谟(Hume)怀疑论表明,知识论取代本体论以追求理性知识无限性的失败,既预示着形而上学的危机,又暗示着哲学的合理性在于必须划定知识的界限。

形而上学的危机处境对于人类心灵生活极为不利。人在天性中就包含着哲学的成分,有哲学就有形而上学,形而上学或哲学一般是人类的本性。只要人类不仅是“知”的动物,只要人类终究还需要信仰,有着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有着对无限和整体的玄学渴慕,形而上学就不可没有。正是基于这个理由,康德给自己规定的哲学任务是:“我要扬弃知识,是为信仰留地盘”。在“先验哲学”中以“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为题,康德追问:知是如何可能的?经验知识的可能性条件和界限如何?知的局限性或有限性如何使得知在形而上学领域内无所作为?

康德认为,知识必须符合“先天综合判断”并具有形式和质料两个构成要素。知识的形式是知性的一种能力即知性的先天形式。知性先天形式有“先验的”和“超验的”两种运用。知性形式的先验运用使科学知识的先天综合判断成为可能的和有效的,它构成“内在的形而上学”,知性形式的超验运用是理性的僭妄,它使形而上学的先天综合判断成为不可能的、无效的,它构成“超越的形而上学”。内在的形而上学探究关于经验现象界的有限事物的知识得以可能的条件,实际上即知识论,它解决的是“知”得以可能的普遍必然的形式条件;超越的形而上学则以超越的理念为“本体”对象,其探究无关乎经验知识,仅关涉人类心灵出于本性所作的形而上学的设

定。与此相联系,“本体”具有了二重意义:在“先验”意义上,本体乃是“主体”、“自我”或“我思”,这个先验的自我或主体自身是不可“知”的,它是经验杂多的多样性之统一的条件,是经验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的条件,在就是“内在的形而上学”的本体;在“超验”意义上,本体即自在之物,就是“灵魂”、“世界”、“上帝”等理性理念,这个本体是超越的,它超出出现象界,不能用知性范畴加以认知,因而它在主客体关系中不可“知”。康德暗示,这个本体作为人类心灵出于本性的必然设定,或许能为我们尚不了解的“理智直观”所把握。

康德哲学留给我们的真正财富是他对形而上学的追问。他在知识论层面上解决了科学知识的可能性之后,接着提出:未来形而上学(超越的形而上学)是如何可能的。这一问题的提出使康德站在传统和当代的交界处:作为传统本体论的继续,超越的形而上学成了一个信仰的领域;作为当代哲学的生长点,则必须回答未来形而上学如何可能这个关乎人类本性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的前提就是如何理解这个问题本身。在黑格尔那里,未来形而上学如何可能的提问其答案就隐藏在传统本体论和知识论的内在统一性中,他的逻辑哲学作为形而上学的集大成者和最终完成,以最抽象、最普遍的范畴“纯存在”为开端,通过概念系列的逻辑演绎,推论出一个“存在”、“本质”、“真理”三者统一的完整严密的范畴体系。在他看来,这个体系既是本体范畴的逻辑展开,又符合从感性到理性、从低级到高级的人类认识过程,因而表现为本体论和知识论的统一。

西方哲学的第二次转向是“语言论转向”,即近代知识论向现代语言论的转向,它作为一场哲学运动,是从攻击和叛离黑格尔这位名声赫赫的德国教授开始的。

在西方人的精神信念中,哲学在本质上是对人的生存境遇的理论表达和存在意义的终极关怀。人之所以有哲学禀赋,是因为人生精神维度的二重化所致:一方面是对人生的有限、苦难、悲剧和神秘的深重喟叹,另一方面是对人生的自由、绝对和永恒等终极意义的执着追求。人生在此的有限领域却渴求无限和永恒,作为短暂的感性生命个体却期望成为超迈卓绝的亘古生灵。当人渴望超越、追求自由、冥思终极意义时,人始具有了哲学禀赋。哲学的产生是为了给人的生存得以可能提供一种终极本体的理性论证。人的生存经验积淀和保存在语言中,而语言的逻辑语法研究使联系动词抽象化为动名词或分词则使人的哲学禀赋现实化为哲学理论

形态。作为人性禀赋的哲学就其产生而言是个语言性事件,“存在”(Sein)之本体和实存二重意义的剥离正是人生精神维度二重化的哲学表达。反过来说,“存在”之本体和实存二重意义及其相互关系的讨论不过是对人生有限和无限、暂时和永恒、此岸和彼岸的二重精神维度所造成的基本困惑给予终极关怀和追求统一信念的哲学努力。

人生精神维度的二重化暗示着人性的分裂和人类智慧的分裂。由此,哲学作为人类智慧的最高形式,其本身也分裂为本质决定实存的形而上学和实存决定本质的科学主义两大思潮。分裂的哲学智慧从各自的立场关怀人性的分裂并在各自的传统内寻求人性统一的基础。席勒(Friedrich Schiller)指出,“联合起来还为时尚早,你们分头去找吧,真理才会找到”;柏拉图的“洞穴”比喻在感性生命与绝对的理念本体之间区分出不可通约的对立,个体存在被遗忘和隐没在对抽象、普遍的理念本体的玄学关注里;亚里士多德摇摆于感性个别与抽象一般之间并最终选择了“纯形式”的上帝;经院哲学中唯名论和唯实论就感性生命与上帝神性的真实性展开了持久的争论;笛卡儿借助“我思,故我在”建立起来的理性却无法调和思维与物质的二元对立;休谟的怀疑论迫使康德在现象与本体、此岸与彼岸、知性与理性之间划下一条威胁人的个性统一的冷峻“鸿沟”。

知识论取代本体论意味着理性的胜利,理性的胜利造成了科学技术和社会的进步,但人性的完整却被分裂为碎片。黑格尔用“正—反—合”的辩证法模式阐释二元对立的发展观,试图在过程哲学中克服本体论和知识论的分裂,完成人性和智慧的结合。但是,他的“A=非A”的辩证公式中已经引入了“不能同时而语”的时间变量。他为维护思辨体系和绝对理性的完整性而牺牲了人类的感性生活。马克思深刻指出,问题不在于思辨地论证人的绝对性和无限性,而在于实际地看待现实的人的感性生活和生存境遇。与马克思对工人阶级被剥削、被压迫的生活境遇的热切关注和寻求人的现实的、感性的解放不同,现代西方哲学更愿意在理论层面上关注现代人的个体生存的苦难、悲剧和边缘状态。饱经内心痛苦的丹麦僧侣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诘难理性并要求把哲学的注意力转向个人。在现代西方哲学的视野中,现代人的生存危机,不仅是技术理性造成了人性的分裂,更深层的根源在于,由于上帝、形而上的本体和逻辑理性的抽身离去,人失却了终极实体的背靠和稳固根基,置身于“无家可

归”的被抛于世状态。理性逻辑使感性生命的自然灵感减退,形而上的本体无法慰藉个人的孤独灵魂,上帝的抽身隐没使人最终失去了超越和获救的希望;诸神的逃离意味着黑夜降临,人生在世失去了根基。既然诸神、本体和逻辑都是“存在”(Sein)的实体化和理性化,存在的隐没就使人有必要站出来“生存”(Existenz, 动词existieren),而语言为人提供了生存一番的可能性。惟有语言处,才有世界和历史。人与存在的关系本质上是人与语言的关系,语言即人的世界,人永远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质言之,人的存在就是语言性的,语言是人的存在方式。

感性个体的存在(Sein)是此时此地(Da)的在此存在,即此在(Dasein)。Dasein意味着人不再是个外在的实体、抽象的主体或超越的无限,它表明感性个体的情绪性在世的方式以及感性个体与存在的本体论关联。哲学把Sein当作一个Seiende(在者)去探究使传统形而上学遗忘了Sein本身,只有Dasein才是存在意义的追询者和展露口,而人这个此在在场并构成其本质,以照亮、去蔽、敞开的方式呈现出世界。在语言这一个人的存在方式中,Sein和Dasein的意义得以揭示和敞亮。无家可归的现代人的精神灵魂在哲学的语言论转向后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家——语言是存在的家。

语言是存在的家,这当然不意味着人拥有语言便恬然安居于世界,也不意味着人通过语言去创造一个世界,这只是表明,此在之生存就是走向语言之途,是“在途中”。人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使人与世界的关系表现为“意义”关系,意义需要解释和理解。“此在—语言—解释”是揭示人与世界多种关系和存在意义之生成的实行方式。

在某种意义上说,本体论向知识论的转向是理性取代本体的地位;知识论到语言论的转向则是语言取代了理性的王权。但由于西方哲学中英美传统和欧陆传统的内在差别,语言论转向后的西方哲学表现出对语言研究的两种传统的不同旨趣。美国哲学家莫尔顿·怀特(White)认为“二十世纪哲学史是刺猬与狐狸的历史”<sup>[5]11-12</sup>,他称欧洲大陆是“刺猬”的国度,欧陆哲人对世界的深层和超越的本质倾注了最大的哲学热情,他们的学说是关于“大事物”的综合体系;英语世界是“狐狸”的故乡,英美哲人由于对形而上学玄理的反感,主张运用“奥康剃刀”对哲学进行剪裁,在他们那里,哲学仅仅或主要意味着关于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思考和语言学探



究,满足于一个个地分析、解决“小事物”,而不是构造理论体系,在哲学方法上醉心于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拒斥形而上学”成了他们的共同口号,哲学变成了科学的仆从或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一般而言,英美分析哲学关心如何正确地或科学地使用语言,强调语言系统能反映事物的属性和本质,使语言精确化、逻辑化,它继承了康德以数学和自然科学为楷模建立哲学体系的传统,因而数学和自然科学被他们置于哲学研究的中心,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命题表达方式成为衡量哲学命题表达方式的标准,要求以数学或自然科学的模式纯化语言的意义,强化哲学的精确性和逻辑性。欧陆人本哲学则强调语言的多义性、隐喻性、非工具性、意义的增生性以及语言对人类生活的普遍意义,对于把数学和自然科学置于哲学的中心地位的合理性持怀疑态度,要求深刻理解人类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根源,反对按数学和科学化了的逻辑语言去建构哲学,要求把语言从逻辑和语法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哲学的语言是诗化的语言,哲学的智慧是诗性的智慧。

### (三) 科学主义与形而上学

如前所述,“存在”之实存和本质两种意义的剥离使西方语言及哲学中具有了“科学性”和“哲学性”两类范畴,因而,在西方哲学中形成了“科学主义”和“形而上学”两大传统。一般说来,在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科学主义者对有限、具体和确定的感性实存的对象抱有更大的兴趣,他们更多地关注经验世界,对于形而上学家关注的永恒、无限、绝对和彼岸并不考虑很多,也不认为有多大必要。他们对世界的态度是理性的和逻辑的。当这些人或由于对形而上学的玄反感,或由于根本搞不清哲学和科学的区别而来研究哲学的时候,哲学便从至高无上的形而上学降低到科学的水平。由于哲学与科学面对着同样的对象世界,具有共同的理性、逻辑和经验方法,在对哲学问题的科学主义态度中,哲学跻身于科学的行列已经认不出自己了。科学主义哲学注重自然科学的成就并寻求此岸世界的真理,较少有形而上学家的宗教情感、神秘主义和非理性主义色彩。形而上学家则试图把哲学带离经验和实用的领域,他们努力区分哲学智慧和经验世界的实用知识,他们虽然也研究具体科学使自己具有多方面的教养,但其科学成果不过是宗教和哲学沉思的附属产物。传统形而上学家的形象是:既轻视荣誉也拒绝盈利,只想做一个通过沉思以达晓真理的“思想者”。

科学主义和形而上学两大思潮的并存和对立,早在古希腊哲学的源头就已产生。但由于各种原因,直到文艺复兴开始前的西方哲学,主要成为形而上学的历史。形而上学的Ontologie这个思辨原理体系既支持了西方的科学,也造成了近代科学对Ontologie自身的反动。到了近代知识论转向时期,随着近代科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科学对经验事实世界的发现和认识,使哲学家在逻辑必然性的力量之外,还感受到了事实的强大力量。由哲学和神学携手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和人类生活原则,在科学理性精神面前日趋崩溃,形而上学体系亦开始在科学精神面前为自己的合法性证明,科学对哲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为科学的认识提供认识论的根据,或者放弃自己的存在。

所有要求作为一门严肃科学的当代哲学,都认为一切科学,包括哲学,只有一种共同的认识方法,这几乎已成为老生常谈。这种信念完全符合十七世纪的伟大传统。这种信念认为,对哲学的所有拯救都依赖于这一点,即:哲学以精密科学作为楷模,首先把数学和数学的自然科学作为方法的楷模。<sup>[6]25</sup>

虽然哲学家也没有放弃纯粹思辨的原理,Ontologie世界的逻辑理念和认识论世界的经验事实及其关系成为他们思考的新问题,但人类沉醉于现实世界的成功,“知识就是力量”成了人类的基本信仰,科学就是一切,永恒、绝对和彼岸已被忘却,“科学与常识的携手协作,导致了形而上学的崩溃”。哲学重新回到了形而下的经验世界,在注重经验、功利的英国人那里,哲学杂志讨论着化学、农业和技术知识,伦理学和政治经济学都算作哲学。一切有关经验世界的知识都可以称之为哲学,自然科学的方法、实验和数理分析方法以理性的面目占领了哲学。黑格尔的“思辨哲学”注定要成为现代哲学攻击的对象。他试图在康德摧毁了教条主义的形而上学和批判地证明经验科学的正确性后,通过统一本体论和知识论来调和形而上学与科学精神的对立。他创造了思辨体系却没能摆脱实体、本质、因果必然性等传统哲学的语言系统和范畴,这使他成为传统形而上学的最后和最高代表,并受到了语言论转向后来自英美科学主义和欧陆人文哲学两方面的攻击。

从科学主义的现代视角来看,近现代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就形成对科学的无限崇拜,哲学在英美世界以理性主义的经验方法和数理逻辑方法关注着形而下的经验世界,经验实证和逻辑分析的理性原则是现代科学主义思潮的主导线索。孔德的实证哲学



要求用科学中的实证精神去改造哲学, 实证哲学成了关于现象领域内的各种知识的综合; 随着十九世纪末的物理学革命而产生的经验批判主义, 既拒绝讨论经验以外的问题, 又指出经验因其不断变化的相对性而不能提供客观真理。马赫 (Mach)、阿芬那留斯 (Avenarius) 等把科学共同体中通用的衡量科学性的标准和规范 (经验性、精确性和可检验性) 搬用到哲学中来, 开始了对思辨的本体形而上学的批判。他们认为, 形而上学是超经验的、非科学甚至是反科学的, 提出了“必须清除哲学和文化中的形而上学”的实证主义纲领; 这一纲领后来在逻辑经验主义 (石里克 Schlick、卡尔纳普 Carnap 等) 中得到延续, 他们为数理逻辑的成就所鼓舞, 使哲学变成了逻辑分析的工具, 它把实证主义的经验原则逻辑化, 把哲学的任务归结为对科学语言的命题结构的逻辑分析, 从而把许多传统的哲学问题完全排斥于哲学之外, 断言形而上学是毫无意义的, 哲学的功用在于用实用主义标准在语言结构之间进行选择。分析哲学 (罗素 Russell、维特根斯坦 Wittgenstein 等) 使言论转向在科学主义思潮中成为真正的现实。它把哲学的全部问题归结为语言问题, 把语言分析看作是哲学的惟一任务, 着重分析语言表达式或词语的意义问题, 研究词语与外部实在之间关系的指称问题, 进而把真理归结为语言意义和指称问题上的语句或命题的真假问题。早期维特根斯坦甚至断言, 一切形而上的哲学问题都是“语言病”所致, 一旦在语言分析中清理了“语言病”, 形而上的哲学就会因无事可做而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

但是, 哲学研究决不会因为语言的分析而告终。拒斥形而上学、否定形而上的哲学问题研究意义的分析哲学及其变种在语言分析中却研究的是些诸如真理、必然性、因果性等古老的形而上学问题, 只不过是语言这个新视角入手而已。因此, 在分析哲学之后, 新实证主义的中心问题成了形而上学和科学的划界问题。围绕该问题展开的争论, 力求将科学和形而上学区分开来, 证明科学知识不受超科学影响的支配, 并由此重新讨论了一系列方法论和认识论问题。波普尔 (Popper) 在讨论科学和形而上的哲学划界问题时提出了一个新的科学性标准, 该标准不是看理论是否具有可检验性, 而是看其是否有可反驳性。与原则上可以被证伪的科学理论不同, 形而上学是不能被驳倒的, 这取决于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前提的无限普遍性。如果说波普尔起初还是和实证主义一样生硬地在证伪主义方法论

基础上给形而上学和科学划界的话, 那么, 他后来则意识到了形而上学假设在科学中的重要作用。波普尔对形而上学态度的变化表明, 在经过给科学和形而上学之间划界的长期探索和争论之后, 最终还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形而上学是不可避免的, 无法从哲学中清除形而上学问题和语言中清除形而上学的假设。从而承认了形而上学的价值, 承认了它在科学知识中的重要作用。蒯因 (Quine) 甚至认为任何科学理论的研究都必须是在一定的本体论观点指导下进行的, 即任何科学理论都包含着本体论的承诺。

英美科学主义思潮在讨论科学和哲学的关系时, 从拒斥形而上学转向科学理论中的本体论承诺, 使形而上学在科学研究中得以复兴。但真正说来, 这种复兴只是表明他们多少还承认一点形而上学在科学研究中的假设作用和意义。必须指出的是, 科学主义思潮从言论视角所拒斥或承诺的仍然是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拒斥也好, 承诺也罢, 依然摆脱不了实体、偶性、本质、因果必然性和客观有效性等传统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或知识论范畴。就此而言, 从科学和哲学的关系中形成和产生的关于形而上学合理性的疑问, 不仅过去和现在存在, 并且随着将来讨论科学和哲学关系视角的任何转化都会发生和出现。由此, 我们认为, 由于形而上学的范畴和涵义基本未变, 形而上学在科学主义思潮中的命运并未构成它的真正危机。

#### (四) 现代人本主义与形而上学

现代欧陆人本主义的真正精神在于它的形而上学性, 即它的本体论、宗教观和非理性主义方面。当然, 欧陆人本形而上学与传统哲学中的实体形而上学、神本形而上学和理性形而上学有着本质的区别, 因而与科学主义思潮所拒斥或承诺的、具有传统意味的形而上学也有着本质区别。现代人本形而上学坚守哲学本身的古老旨趣在于探求人生的意义和归依这一信念, 对传统哲学中与经验世界密切相关的认识论、逻辑学和方法论等问题不感兴趣, 认为这些问题是科学的对象和内容。现代人本主义不关心科学并非因为科学与人无关, 而是因为科学是有限的, 不能达到永恒、绝对和彼岸, 不能认识人的真正的、与上帝和绝对相通的本质。

现代欧陆人本主义的诞生地和精神领袖是德国。在哲学精神的境域中, 德国思想之于现代欧陆相当于希腊智慧之于西方世界。黑格尔曾自豪地表达了有教养的欧洲人、尤其是德国人每提及希腊时总有一种如归家园的亲切感<sup>[7]157</sup>。这里, 有必要追

溯一下西方精神的文化渊源——“两希精神”，即影响西方文化精髓及形态的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

希腊精神的特征是二重性：一方面是欢乐、自由、乐观的人生态度；另一方面是对人生的有限性、悲剧性和神秘性的正视。在希腊人的精神世界中，人生被看作行乐，最严肃的思想与制度在他们那里也变成了愉快的东西，希腊人的神明快乐而长生，他们心目中的天国是阳光普照之下永远不散的筵席，最美的生活就是和神的生活最接近的生活。希腊精神的另一维度是，普罗米修斯的受刑，狄奥尼索斯诞生、受难与再生的苦难经历，爱神阿芙洛狄忒自己无法有圆满的爱，俄狄浦斯智勇超人却逃不脱杀父娶母的厄运，奥德赛有家难归……希腊精神也意味着人生有有限、悲剧、苦难和神秘。希腊精神二重性的象征意义在于，由于意识到人生的有限、悲剧和神秘，人才如此热烈地享受欢乐、自由、乐观的人生，以英雄主义的历险和无畏、乐观主义的豪迈和豁达去抗争神秘莫测的命运，抗争生命的有限和注定无法逃脱的不幸。神人合一的“英雄”是希腊精神的人格化身。有限与无限、暂时与永恒、此岸与彼岸的对立在英雄式的人格精神中被超越而趋统一。

与希腊精神以积极进取之心去对抗苦难、悲剧和神秘的人性特征不同，希伯来精神则要求以赎罪、信神的虔诚之心去忍受苦难和悲剧。它所表现出的人性二重性是：此岸与彼岸，赎罪与救渡。伊甸园中亚当和夏娃的犯禁预示着人性本恶。此岸现世的人生就意味着禁欲、信神、忍受和赎罪，放弃意志，期待来世的获救。

总之，希腊精神与希伯来精神虽然都强调人生的有限和悲剧、苦难和神秘，但前者主要以进取的人格去抗争苦难，追求自由；后者则认定人生绝对是罪恶、苦难，因而必须忍受和赎罪以获得超越和拯救。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积极进取并执持于今生今世，后者消极忍受并抛弃今生的欢乐以期待上帝的救渡；前者背靠人本身，后者背靠上帝。二者的一致性在于，超越人生的有限、苦难和悲剧去执着追求人生的自由、无限、绝对和永恒等终极意义。

希腊精神的最初理论表达是早期希腊哲学和科学未分的古代智慧，它既关心人的现世生存能力的提高，又沉思有限的生命如何超越为无限的永恒存在，怎样的终极依靠才能慰藉个体灵魂的苦悲和期待。哲学的原本旨趣就是探究人生的意义和归依。语言言说着人的生存境遇和终极意义。

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的Logos(逻各斯)就是语言和言说，同时也意味着自由和超越、理性和规律、无限和永恒。逻各斯就是智慧，哲学就是爱智慧或追求智慧。到巴门尼德时，随着语言形态的成熟、语法体系的建立和语言的逻辑化、形式化，当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从系动词中抽象概括出动名词On(Sein/Being)时，以On为研究对象的形而上学本体论便得以确立。由此，希腊精神中的和人的生存相联系的自由、超越、永恒、绝对等终极意义问题，转变为Sein(存在)及其范畴的逻辑推演体系，理念、实体、必然性等存在范畴和属性以本体论的面目占据了哲学领域。后来，在罗马晚期时代，希伯来精神和希腊哲学以及罗马的法制精神结合在一起，整合成基督教文明，神学本体论取代实体本体论成为形而上学的主要语言。

随着近代哲学中的知识论转向，理性取代了实体，关于自然界的科学知识成为资本主义时代征服和获取自然的主要旨趣和历史要求。科学知识为了论证自己的合理性、有效性和普遍必然性，力争求得哲学上的支持。理性成了知识的标准，数学的思维模式被引进哲学，命题的逻辑联系成了哲学知识的普遍要求。科学主义取代了形而上学，而人生意义、价值等关涉人的安身立命之所的问题被排除在哲学的论域之外——哲学中的科学主义只顾埋头为科学知识寻找理性的基础，却不问人生意义的灵性根据。就此而言，现代哲学中的科学主义思潮正是在科学知识是否应该有一个实体化的基础这一意义上拒斥或承诺形而上学的。

科学主义哲学并非不关心人，它也逻辑地探究伦理和价值问题，这种哲学支持下的科学知识帮助建立起了一个工业文明的社会，人的生存能力得以增强，社会历史发展到了更有保障、更安适、更有主动性的阶段。然而，人的灵性、生存的意义、对有限的超越、神秘的领悟、抉择的苦恼、灵魂的归依、无限和永恒，这一切都不是数学式的思维和理性的三段论逻辑推导等科学化了的哲学体系所能感触到的；技术理性和科学知识建立的现代国家、社会制度成了对人异在的客观力量，反过来窒息着人的内在灵性，对物的追求意志越强烈，向外部世界攫取越多，自我也越迷惘，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越成疑问。理性能使人知识渊博，但也使人的自然灵性减退。德国民族的内在精神显得深沉、内向、含蓄而富有厚重的内在激情，表现出一种沉重得像背负着十字架的沉郁气质。他们对工业文明的生活世界中出现的轻狂和功利态度、科技理性造成的非人

化境遇有着深切的体验和独到的感受。他们重提人生的意义,在形而上的层次上殚思竭虑地试图去克服有限与无限、经验与超验、现象与本体的尖锐对立,以恢复人性的完整统一。

现代欧陆人本主义哲学在本质上说是一种人生哲学。它既不像科学主义思潮那样拒斥或承诺本体形而上学,因为现代科学主义思潮所谓的本体或形而上学仍是知识论中作为科学知识基础的实体;它也不像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认为本体论或知识论的形而上学虽然也关注人生问题,但却把人的存在及其生存意义消融于关于世界本体的理性逻辑认识中去了。现代欧陆人本主义的形而上学性在于它从“人”这个“此在”出发去追问“人”的存在意义,去“超越”人的生存状态上的有限与无限、暂时与永恒的对立,因而它在精神气质、语言形态等诸多方面更愿意追溯“两希文明”的源头,寻觅人性的初始状态,赋予个体生存意义以现时代的终极解释和本体论关怀。

叔本华(Schopenhauer)作为现代人本主义哲学的开创者,他在反叛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绝对理性本体论时,建立了以“生命意志”为世界本体的人类生命本体论,他从形而上学角度视生命意志为本体,又从伦理学角度证明生命意志是人的欲望。生命意味着欲望,欲望意味着痛苦,生命就是痛苦。认识人就是认识生命、欲望、痛苦,而不是认识理性和思维。由于背靠上帝,叔本华在精神信念上更倾向于希伯莱精神的痛苦、受难和期待拯救,因而他的生命意志哲学没有最终肯定生命,而是否定感性生命。但他也没有走向理性化了的上帝,而是转向东方的佛教,认为解救生命痛苦的根本出路在于达于佛教的涅槃或人生整体的寂灭。

与叔本华“弃生”不同,尼采(Nietzsche)虽然也敏感于传统理性本体论和实体化神学对人的感性生命意志的摧残,但他背靠终极人生,承袭希腊精神的自由、欢乐和感性解放之源,急切地呼唤酒神精神、强力意志和希腊英雄式的“超人”。叔本华从生命意志不可遏止的欲望中窥视到个体生命的颓废,尼采则强调生命的很大颓废源于生命意志的匮乏、软弱和衰退,而造成生命力减退的根源就是理性、形而上学、道德和基督教。尼采以激越的态度向颓废的文化挑战,以酒神式的“沉醉”去唤醒充满、丰盈的生命力,以坚强者的道德代替懦弱者的道德,以创造的超人代替空幻的上帝,最终达到肯定生命的审美人生。

弗洛伊德(Freud)精神分析理论的核心是“原

欲”本体论。他一方面在本体论上追随叔本华把“性欲”看作“欲望”的焦点,另一方面又追随尼采对现代文明和性道德进行攻击,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二者的综合。但他不像叔本华那样弃绝生命,而是肯定生命;也不像尼采那样相信高扬生命力就可以战胜颓废和虚无的厄运,而是深深忧虑于人类绝望境遇的无法超越。弗洛伊德的原欲本体论的“自我”在现代文明包围中的本已境遇是“焦虑”,生存于世的“我”,总是处于某种焦虑之中,焦虑于可怖的黑暗、亢奋的性欲、道德良心的裁判。也许说不出焦虑的根本原因,却明白地自知正处于焦虑之中。文明导致焦虑和压抑。弗洛伊德甚至断言:“文明的发展可能最终会引导人类的绝种,因为它对性机能的影响不利”<sup>[8]64</sup>。这是对文明真正彻底的绝望!焦虑不安的现代人如何超越呢?他认为自我的本能虽可在创造性活动中移情或升华,但却无法真正消除焦虑状态。作为犹太学者,弗洛伊德背靠着上帝——在绝望中期待拯救。

胡塞尔的现象学既不满意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唯意志的生命本体论,坚信追求可靠的、绝对的、不可动摇的“知识”是古希腊以来西方哲学的正宗;但也不满意传统思辨哲学的实体形而上学和现代英美科学主义用僵硬、冰冷的逻辑取代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怀。现象学哲学具有在现代哲学条件下综合统一英美科学主义与欧陆人本主义的倾向。因此,胡塞尔一方面以主体性为原则把哲学建立成“本质即现象、现象即本质”的以现象一元论为基础的严密科学的哲学,以求确定的、必然的、绝对的知识;另一方面又以极大的热情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意义,消融主客体的僵硬对立,回到更为本源性的同一的世界——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是前主客体分化时期的绝对本源性状态,因而生活世界是显现给人的,人对生活世界的把握方式是现象学的“看”而不是知识论的“知”。虽然胡塞尔本人的理想是把现象学建立成严密科学的关于生活世界的哲学体系,但他的后继者则更愿意把现象学作为一种方法去建立各自的哲学,后来的海德格尔(Heidegger)、伽达默尔(Gadamer)等在建立自己哲学时都得益于现象学方法。

如果说胡塞尔是在西文哲学传统的背景下进行他的现象学思考的,那么,他的学生海德格尔则在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尼采的启发和引导下,运用现象学方法,开始了追问“存在”(Sein)意义的道路。克尔凯郭尔首次赋予Sein以个体性、主观体验的含义,把“孤独个体”作为人的最根本的

存在方式,分析孤独个体的“恐怖”境遇;尼采对现代人的颓废和虚无境遇的分析,对虚无主义、形而上学和现代文明的批判直接成为海德格尔思考的源泉。海德格尔是从“语言”入手去思“存在”的,因为语言是存在的“显现”和人的“言说”的统一。在他看来,传统形而上学的最大迷误在于混淆了Sein(存在)和Seiende(在者),即把存在当作一个对象性“在者”去研究,遗忘了存在的意义。海德格尔追问Sein的意义,就是在问:Warum ist überhaupt Seiendes und nicht vielmehr Nichts(为什么竟是在者存在而不是无?)<sup>[9]141</sup>,提出这个问题就是作哲学思考。科学只问及诸“在者”(Seiendes)是什么,原则上,科学拒绝“无”而把“在者”当作对象,因为“无”是科学所达不到的。哲学或真正的形而上学是关于“无”的学问,“无”作为哲学的对象才是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而“无”之发现及把握全赖于人,只有人才能从整体把握“在者”并超越整体达到“无”。人是世界的展露口,世界通过人才有意义;只有人才有他的世界也才有“无”,因而,形而上学是人的本性和基本事件。并且,人作为存在意义的追问者、“无”之发现者,使人这个此在成为惟一值得追问的问题。胡塞尔的“生活世界”在海德格尔这里成了人生活于此的世界,即此在的生存状态的基本结构是“在于世界”。在于世中(去在)是此在的一种被抛于世状态(非本真状态)。人的本质是“烦”,其基本情绪是“畏”,人在畏中发现了本真状态——无。死启示着无,“无”是体会和领悟到的自己的“本己”。海氏的“无”就是“存在”,它是人生的终极意义和终极价值,真正说来,相对于人这种“此在”而言,它是“彼在”(上帝)。人只能凭此在这个窗口诗意地思Sein这个彼在,但对Sein本身则须保持缄默。Sein作为人的彼在是终极、绝对、无限和永恒之域,追问它是为了有可能使人发现人生的有限、短暂和真正意义。海氏背靠人这个此在,其哲学则是期待上帝(终极绝对和永恒无限的存在)的思。这表明海氏同时受希腊精神和希伯来精神两种传统的影响。后期海德格尔受东方尤其是中国哲学的影响,把中国哲学的“天—地—人”三维结构和西方文化结合起来,提出“天—地—神—人”四维世界结构<sup>[10]1192-1193</sup>,使他被誉为第一个超出西方传统的具有世界性、国际性的思想家。

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就是要从那深远源始的存在之澄明中去寻找人之为人的安身立命的根据。但是,哲学和科学、理性和技术由于遗忘了存在,造成了人的离家失居状态。存在的隐匿,大地的

闭锁,世界之夜的降临,意味着人的生存的天命和如何生存的问题一再地失落。究其原因皆出于哲学和科学不会思,哲学和科学造成了语言的荒疏。语言是存在的家园(house of Being),因此,人要重返家园就须拯救语言。本真的语言是诗,是诗人给诸神命名,并命名一切在者之所是,诗人思入那由存在之澄明所决定的处所“乃是存在的敞开状态(Offenheit des Seins)”<sup>[11]277</sup>。

如此,在海德格尔那里,人的生存危机、形而上学危机和整个世界的危机,都被归结为“语言”的危机。为了克服危机并寻找人生的意义,语言成了哲学关注的中心而形成语言本体论。

语言本体论哲学的真正开端是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在他看来,Sein的意义只有通过语言才能得到显现,Sein表现在语言中;而语言又是人的家园,是人的历史性生存的基础,人通过语言的言说,才能领悟存在,才能生存。语言既可以提示存在,使存在澄明,也可以遮蔽存在,关键在于人说的是什么样的语言。如果人的语言迫于传达的需要而遵循公众的逻辑和语法,这种语言就不能提示存在;相反,只有本源性的语言,即从逻辑和语法中解放出来的“诗的语言”才能提示存在,使存在恬然澄明,即人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

伽达默尔以语言为本体的解释学运用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展开海德格尔的本体论视界,继承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到海德格尔的解释学传统,建立了解释学哲学。他认为理解和解释的现象即人所面临的全部世界经验,是哲学解释学的基本问题。他把理解和解释视为人的生存方式,“理解不仅属于主体的行为方式,而且是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sup>[12]6</sup>。理解就是此在对存在意义的领悟和体验;把理解的内容加以实现和发展就是解释。理解和解释是同一的,二者在内容上是统一的。理解和解释是通过语言进行的,能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语言就是理解本身得以进行的普遍媒介”<sup>[13]496</sup>。由于理解和解释与语言的密切关系,因而语言是人与世界发生联系的中介。一方面,人通过语言对世界经验进行理解和解释从而拥有世界,另一方面,世界也只有表现在语言中,才能成为人生活于其中并对人有意义的世界。这样,人和世界的存在都离不开语言,语言是人与世界统一的结合。语言使存在的意义得以生成。

在德国人本主义哲学发展到语言本体论的解释学阶段时,在法国产生和形成了结构—解构主义哲学。德国的解释学和法国的结构—解构主义哲学都

是从语言方面入手探寻那深不可测的终极本体的奥秘。但是,解释学侧重于从人和世界的意义生成角度,去研究语言的结构(结构主义)或颠覆语言的形式结构(解构主义)。

结构主义所谓的结构,是和语言、符号、文本的形式同等程度的概念,结构分析就是对语言文本的形式进行分析。形式(form)是个含义丰富而多样的概念,归纳起来主要有:(1)形式是指内在观念性本质和先天规范。康德和亚里士多德就是在这意义上使用形式范畴的;(2)形式是指要素的内在组合或结构;(3)形式是指事物的外在形象和状态。其中,第一种“形式”在西方哲学传统中曾被视为“终极本体”或形成现象存在物的本体基础。结构主义把结构区分为“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其根本任务是通过研究语言文本的组合形式去发现或探究某种普遍、客观、抽象的理性模式和深层结构。结构主义的思想先驱致力于寻求语言的先验结构:结构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列维-施特劳斯(Lévi-Strauss)醉心于寻求原始民族神话的无意识结构,福柯(Foucault)则认定各种文化知识受某种无意识结构支配。根本说来,结构主义只对作品和文本的深层抽象结构、逻辑结构感兴趣,而个体生命的具体境域、感性生命的活的体验和生存意义等尼采、海德格尔所关注和思考的问题被完全拒斥了,或者说被抽象逻辑结构隐没了,感性生命的情感、意义和自由被还原成为“本质”(理性形式)。这样,结构主义就以解释学对语言本体的强调为转折,把叔本华、尼采到海德格尔、萨特(Sartre)对有限感性的个体生命之主观性、非理性的强调转向去追求客观普遍的、永恒绝对的理性结构。这一方面表明,哲学在表达对人生意义的终极关怀时不可以太过放纵个性和非理性的主观性,不可在相对主义道路上走得过远;但另一方面,结构主义对深层的、抽象的、逻辑的和客观的“结构”的无限崇拜,具有复兴传统理性或实体形而上学之嫌,这导致了解构主义从结构主义内部对它的颠覆。

从叔本华、尼采到弗洛伊德再到海德格尔的现代哲学的运思旨趣,一直试图颠覆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传统。但是,尼采由于把“强力意志”作为世界的根本和人生的背靠,被海德格尔称为“最后的形而上学家”,当海德格尔本人也执着于“存在”意义的终极追问时,德里达(Derrida)认为他也最终返回到形而上学的故里。为什么这些思想大师这一“反”把自己也搭了进去呢?究竟什么是形而上学呢?

解构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德里达认为,海德格

尔的生存本体论、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以及结构主义都是“在场的形而上学”,即把绝对的本体或真实的存在归结为某种在场的绝对参照物。如果说传统哲学是把“理念”、“理性”视为绝对,是理性这种“绝对”的形而上学“在场”;那么,现代欧陆人本主义哲学则把“感性”、“生存”或语言的“深层结构”视为绝对,是感性、结构这种“绝对”的形而上学“在场”。因此,以反对形而上学为标榜的欧陆人本主义不可能真正克服形而上学,它强调理性和感性的差别不能掩盖它们都是以某种“绝对”在场的形而上学这一特征。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否认一切“绝对”,比以往任何哲学更强调差异、不同一和非逻辑性,认为强调同一的、绝对逻辑形式的结构主义是一种形而上学幻觉。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的根本目的是对一切“在场的形而上学”实施“解构”战略。在他看来,所谓形而上学,就是依赖一种无懈可击的基础、第一原则或不可怀疑的根据,来建造整个意义等级的思想体系。这个形而上学的概念体系具有“二元对立”的构成特征,如在场与不在场、主体与客体、先验与经验、灵魂与肉体、理性与感性、形式与内容、现象与本质、中心与边缘等,所有这二元对立可以归结为“在场—不在场”的对立,并且双方都不是平权的,而是一方总处于优先地位,如在场高于不在场,中心高于边缘等。由于形而上学总是突出“在场”的优先和中心地位,故称之为在场的形而上学。德里达认为,“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是“在场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presence)和“语音中心主义”(phonocentrism)的结合体。逻各斯中心主义、在场的形而上学和语音中心主义三者构成西方传统哲学和文化。他的解构战略,就是通过“消解逻各斯中心主义”、“瓦解在场的形而上学”和“消解语音中心主义”来实施的。他认为,从柏拉图到海德格尔及结构主义的西方哲学都具有形而上学性质,都是对“中心”、“本质”、“在场”的追求,都说着形而上学的话语,都属于“逻各斯中心主义”。所谓“解构”就是以“暴力”的手段颠覆和消解逻各斯中心主义,强调“不在场”的一方,如差异、不确定、相对、空白、违背、不可言说、荒谬等。解构主义使哲学、形而上学、本体论真正的不在场,或使之被克服和消解。

德里达的解构理论的目标就是要消解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在场”(Presence)。“在场”是中心、实体和整体的根基,是以“现时”为中心去理解过去和把握未来,相信在场的语言能准确地呈现思想,达

到实体世界的客观真理和理解的普遍性、历史性。德里达则挥动“解构”的利器,以“差异性”原则,向真理、理性、确定性和理解的整体性、普遍性、历史性挑战。在他看来,结构(structure)是西方文化之根,“解构”(deconstruction)就是要消除和分解结构,就是要从西方文化的内部,怀疑和破坏它的结构和秩序,通过消解结构、解拆在场、颠倒秩序,造成内部震荡,从而深入理解这一哲学文化的结构及其局限性,最终将西方哲学和文化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德里达的解构策略对西方以至世界文化的冲击和造成的震荡是剧烈的。他提醒人们注意忘却之物,要求我们向文化的页码之外注视,向我们熟悉的表层语言注视,向假设的根源背后注视。他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否定根本上是对万能的上帝和理性的否定;他对“在场的形而上学”的否弃顺应了当代西方相对主义的时代思潮;他向我们提供了另一种阅读、理解、言述人类精神存在于此的文本世界的方式与策略。但是,中心消散、秩序颠倒、结构瓦解、主体位空、意义确定性的丧失……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魔咒解除了,存在变成了无底的棋盘,人类同时也可能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家园。

由此可知,解构主义一方面是对绝对普遍的理性逻辑形式结构崇拜的极致发挥和理论反动,另一方面直接启动和影响了以“无”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文化。作为现代西文哲学发展的逻辑必然,后现代主义是形而上学的现代困境和超越的内在契机,作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思潮,它是对西文文化的一场全面反思和批判。

如何在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氛围中走出形而上学的现代困境呢?美国学者罗蒂(Rorty)积极主张和推进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的终结”,致力于调和欧陆传统和英美传统的对立与分歧,倡导一种非形而上学的泛文化哲学。而具有德国思想特征的法兰克福学派则对于后现代文化的虚无性质持谨慎的批判态度,它在批判从生命哲学到现象学运动对感性个体生存意义的主观性的强调中转向了从社会实践去阐释人的感性生存状态。其中,马尔库塞(Marcuse)的“新感性”学说,运用马克思的社会实践概念去改造弗洛伊德的个体原欲本体论,提出了社会原欲本体论,并进而把人本主义的个人发展论改造成社会解放论。在他看来,“感性”是用于解释人的本质的一个本体论概念,既指人的爱欲、本能等内驱力,也指人的基于这些爱欲的感觉;既指个人的感性,更指客体化的、社会的和实践的感性。人作为感性存在物,既是受动物又是主动

的,既受制于自身的感性和外部感性世界,又通过社会实践使感性对象化,从而肯定自身的感性。人既要沉沦于感性世界,又要占有感性世界。马尔库塞的感性实际上就是爱欲,他的感性的人就是充满爱欲的人,他的感性社会就是充满爱欲的社会。弗洛伊德为人的原欲被压抑而焦虑,马尔库塞则期望通过本能结构的心理革命去释放社会性的爱欲。由此可见,马尔库塞和马克思虽然都强调感性的人、感性的社会实践本体论,但马克思强调通过感性社会实践即生产关系的变革去实现人的现实社会解放和真正自由,马尔库塞则沉醉于通过爱欲本能的心理革命去幻想人的感性审美解放,二者的本质区别不言而喻。法兰克福学派另一个代表人物哈贝马斯(Habermas)的“社会交往”理论,则把人的基本存在方式视为“交往共同体”。但和马克思的在“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人类“普遍交往的共同体”(共产主义社会)不同,哈贝马斯的交往共同体则主要指人的历史性存在的先验前提,其本质是一种语言交往的共同体。

总之,在从尼采到德里达对传统哲学的反叛中,他们颠覆了古典哲学的绝对理性本体论,但尚未走到无“本”主义的维度;从尼采到胡塞尔经历了非理性的自我到先验自我的变化,但都以人本主义为共同特征,这遭到海德格尔对主体形而上学的批判;从海德格尔到伽达默尔以语言本体论代替人本主义,但却遭到德里达从语言论立场出发对整个西方哲学和文化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摧毁性解构。由此滋生出来的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现代西方哲学反传统趋向的极端化——即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极端化。后现代主义的精神品格在于:它永远处在一种动荡的怀疑和否定之中,它使古典哲学精神所追求的确信性和明晰性让位于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从能指、结构、文本到反讽、解构、延异;从中心、秩序到边缘、无序;从对真善美和正义的追求到这一切被语言所消解;生命的价值和世界的意义消泯于话语的操作中,终极本体和深层结构消融于无深度的平面和书写印迹的嬉戏中……它试图摧毁整个西方的权力话语系统,不再对精神、价值、理性、真理、善良、崇高、正义、终极关怀等超越的价值感兴趣,而是沉醉于形而下的卑微琐屑的愉悦之中;它放弃了对超越性、永恒性和深刻性的追求,而在残破的话语世界中,表明了任何恒定普遍秩序的不可能性。它标示着西方哲学从相对主义滑向后现代主义的虚无主义幽谷——人类精神的离家失居状态。

## 参 考 文 献

- [1] Husserl E. 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e phänomenologie[M]. Hamburg, 1982.
- [2] 陈春文. 栖居在思想的密林中——哲学寻思录[M].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9.
- [3] 中国大百科全书: 哲学: 第一卷[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7.
- [4] 法国著名哲学家卡尔·奥托·阿佩尔站在当代哲学的立场上对西方哲学进行了明快的清理, 认为继古代“存在的分析”(本体论)和近代“意识分析”(知识论)之后, “语言分析”(语言论)是现代哲学的基本模式. 参阅李朝东, 卓杰. 形而上学的现代困境[M].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5.
- [5] M. 怀特, 编著. 分析的时代: 二十世纪的哲学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 [6] 胡塞尔. 现象学的观念[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
- [7] 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录[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
- [8] 克莱芒. 马克思主义对心理分析学说的批评[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 [9] 海德格尔. 形而上学是什么[M]//路标.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 [10] 海德格尔. 筑·居·思[M]//海德格尔选集: 下卷. 上海: 三联书店, 1996.
- [11] 海德格尔. 诗人何为[M]//林中路.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7.
- [12] 伽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 上卷[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
- [13] 伽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 下卷[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

## Metaphysics and Its Modern Development

LI Chao-dong, DONG Chun-li

(School of Politics and Law,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 Metaphysics as used in the Western context is a philosophical theory concerning existence, knowledge and culture at their supreme stage, with ontology (ontologie) as its core, which is purely abstract a logic idea.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existential and the essential qualities of Being (Sein) make for the scientific and philosophical categories of language and philosophy and subsequently the two traditions in Western philosophy: scientific and metaphysical. Marxist philosophy remains a strong power in the drastic transformation of philosophy, the realization of philosophy, as embodied in such polar pairs as sense and reason, finite and infinite, temporary and eternal, freedom and necessity etc., is possible only in the concrete social practice, and the meaning of human existence is possible only in its sensuous life.

**Keywords:** existence; metaphysics; language theory; scienticism

(责任编辑: 寇 甲)